

联合隽彦，大学泱泱

——寻访北国与南疆的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

○马庆洲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八十周年之际（联大校庆日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日计算），笔者终有机会亲赴昆明，拜谒“联大”旧址。徘徊于前辈学人生活过的这片土地，驻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下，品味冯友兰先生所撰碑文，不禁心有所感，并联想到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校中的另外几方纪念碑。它们虽然星散在北国与南疆，相隔遥远，但其象征意义，以及所彰显的精神，却毫无二致。重温这几方碑的来龙去脉，抑或还有一丝超越考据学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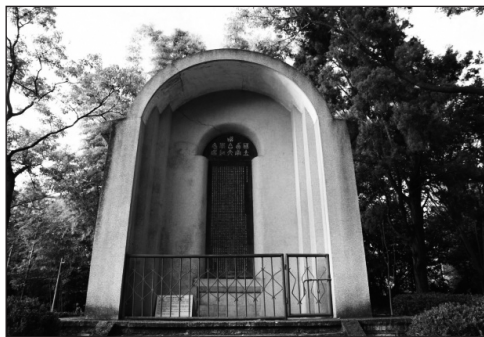
一、昆明联大旧址上的联大碑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结束；联大校歌中期盼的“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理想，即将成为现实。数日后，联大即设置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筹划三校迁返平津。但由于交通等方面的困扰，回迁事宜一拖再拖，直至1946年5月，联大才正式宣告结束。北返前夕，三校在原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今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内立碑以为纪念，这便有了“联大碑”（右图）。

即将作别生活了八年之久的昆明，留点东西以为纪念，是联大实际掌门人梅贻琦的动议；而做一个传统形式的纪念碑，则出于冯友兰的谋划。冯先生回忆道：

“1946年上半年，三校忙于分家和准备北归的事，在有一次清华的校务会议上，梅贻琦说，我们在昆明待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会上我就提议，留下一个有古典形式的纪念品。大家都说好，就推我筹备这件事情。我就筹备立一个完全合乎传统形式的纪念碑。严格地说，这座纪念碑并不是联大常委会正式决议建立的，而是作为在联大中的人为了纪念联大而建立的。碑文是我作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二用。”（《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

此碑的设计与制作，联大几位与其事者颇费过一番心思，梅贻琦、朱自清等人日记中都有相关记录。1946年2月26日下午，朱自清“参加校志委员会茶会，讨论纪念碑问题”。（《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日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载,1945年10月30日,“聘请冯友兰、雷海宗、姚从吾、罗庸、闻一多诸先生为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编辑委员会委员。并请冯友兰先生为该委员会主席”;11月21日,“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志,并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编辑委员会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志编辑委员会。加聘冯文潜先生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志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据此可知,朱先生所言“校志委员会”,是联大为编辑校史而成的临时性组织,其委员有冯(友兰)、雷、姚、罗、闻、冯(文潜)六位。1946年3月2日,梅贻琦“晚约冯、雷、姚、罗、闻、唐、刘、潘、汤、朱(闻未来),便饭,商写刻纪念碑事。余酒食未多进,陪坐而已。十点客散。”(《梅贻琦日记 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朱自清也记下了当日梅贻琦晚宴的情形:“参加梅先生晚宴,主客为唐、罗、刘三人,他们都是纪念碑之设计者。”(《朱自清全集》,第十卷)

1946年5月4日,“联大碑”落成,梅贻琦记录下了当天的情形:“午前有雨。上午九点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余报告后请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辞,来宾请马伯安、严燮成、熊迪之,最后由冯芝生读纪念碑文。会后至后山为纪念碑揭幕,然后在图书馆前拍照,时已有小雨。拍照方毕雨势忽大,在办公室坐约半小时,待雨稍小始出。此或为到此室之最后一次矣。”(《梅贻琦日记 1941—1946》)

“联大碑”整体呈圆拱形,通高一丈五尺(约5米),宽八尺(约2.7米),立

于坡底不算平缓的山坡之上,有台阶可登。碑外围前后两面均有檐,前后面两侧各有两层内壁,外檐和内壁从两侧往中间渐次内收,碑身镶嵌于墙体之中。碑之式样采用中国传统款式,正面南向,上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文系楷体,阴刻,共19行,1178字。因三教授在学术及书法方面的造诣,此碑被誉为“三绝碑”。

冯友兰所撰碑文,简要回顾了联大的历程,高屋建瓴地总结了联大可兹纪念之处: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三校历史不同,学风各异,然八年之久,合作无间,终和且平;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内树学术自由,外争政治民主,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抗战军兴,被迫南渡,然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此为历史所未有。这几点,也为后人了解联大历史、感悟联大精神提供了一把钥匙。联大毕业生、后来蜚声国际的学者何炳棣就认为:“最能表彰联大社团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的莫过冯师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联大碑”背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由中国文学系唐兰教授篆额,数学系教授刘晋年书丹。碑阴所记,虽仅为834位从军同学之名录,但彰显的却是联大学子投笔从戎的整部历史。据统计,抗战期间,联大学生(含长沙临时大学)从军人数达1129人,约占总人数的14%,其中还有牺牲的烈士。联大学生不顾安危、保家卫国的举动,虽然出于战时需要,但他们所体现出

的精神，完全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家国情怀。他们愿意用自己还有些稚嫩的臂膀，去肩负民族兴亡的责任，而不是躲进书斋，任凭家国风雨飘摇！

“联大碑”堪称一部浓缩的西南联大历史（《联大八年》首篇即为冯先生所撰碑文，径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也是中国人存亡继绝努力之见证。在彩云之南昆明西北角的一隅，“联大碑”静静地矗立了四十多年，似乎被人遗忘。然而，时间并没有磨灭其光芒，她终又重放异彩，一生二，二生三，在清华、北大、南开的校园里有了自己的化身。从此，远在西南边陲镌刻着联大精神的这方石碑，不再孤独，而移步于北国上庠之中，润物无声。

二、清华园里的两方“联大碑”

北京西北一隅的清华园，在皇家园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水清木华，疏朗而清幽。漫步园中，细心的人们可以找到两方“联大碑”。他们树立的时间，前后正好相隔二十年。



1988年4月，陈岱孙（右2）、周培源（中）、施嘉炆（右1）、赵访熊（左2）、朱德熙（左1）五位先生为“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

1988年4月24日，作为清华77周年校庆日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典礼在清华举行，陈岱孙、周培源、施嘉炆、赵访熊、朱德熙五位先生为之揭幕。该碑立于清华园核心区域、丙所西南的开阔地带。正面刻有“西山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泱”十六字，字头藏“西南联大”。背阴刻《碑记》，《碑记》额题“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九字，袭用了原碑上闻一多先生的篆字，但省去了“国立”二字。

这方碑的碑文说明及阳面所刻十六个字，均为清华大学时任党委书记李传信所拟。清华校友总会总干事承宪康回忆说：

“他（李传信）参与了学校多个雕塑像、纪念碑的建立，……在甲所与丙所之间开阔地矗立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底地上嵌石为云南省地图，中为联大校徽，这是他同楼庆西、郑宗和、叶茂煦三位同志共同商议出的方案。”（承宪康：《良师益友——怀念传信同志》，载《李传信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李传信本人也曾谈到此碑，说：“立石北面刻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南面刻‘西山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泱’十六个字，不久想用‘联合济济，大学泱泱’，似乎更好一点，但石已刻完，只能算作遗憾了。”（李传信：《西南联合大学50周年感言·附言》，载李传信著《清华往事纪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这方碑虽然不是复制的原碑，但却是三校中最早为纪念联大而立的标志，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1988年10月28日，清华发给“西南联合大学暨云南师范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贺信》中，也特

□ 史料一页

意提到此碑：“清华大学从来都十分珍惜西南联大的历史经验……‘西山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隼彦，大学泱泱’，象征着西南联大的精神与水木清华同在！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激励着清华大学不断前进。”（据档案资料）

2006年3月，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致信清华大学校方，转达冯友兰先生之女宗璞关于建议清华复制和建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的建议，并详加申明其意义（据档案文件）。清华对此建议十分重视，迅即组织各部门研究落实。2007年10月27日，时值联大建校70周年，复制“联大碑”在清华落成揭幕。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贺美英，原北京大学副校长、西南联大校友会会长沈克琦，原南昌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机械系主任、联大校友潘际銮院士，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共同为纪念碑揭幕。“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院士、专程从香港赶来的江国采学长等联大老校友，以及来自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师生代表百余人出席了揭幕仪式。

该碑安放在校团委办公地北侧的绿地上。碑体面向西南，意味着朝昆明方向。校方的报道称：“整个场地的设计表现了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越过重重险阻、百折不挠、矢志民族复兴的精神。设计师依据地形条件，设置了层层跌落的台地，每层台地皆为不规则的折线，隐喻了中国知识分子宁折不弯的刚毅性格，富有力度。”（清华新闻网，2007年10月28日）

清华复制的“联大碑”，碑身形制完全沿用昆明原碑，但碑身外檐的形状，改为了方方正正的箱形，而非原碑的圆拱形。碑体两侧增加了新内容：西北一侧上



2007年10月27日，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揭幕仪式上部分嘉宾合影。左起：潘际銮、沈克琦、顾秉林、贺美英、王学珍、胡和平

刻：“西南联大校训 刚毅坚卓”；东南一侧，刻有清华中文系徐葆耕教授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志》。

三、北大校园的“联大碑”

自古色古香的北大西门走进燕园，跨过三孔圆券石拱桥（称“校友桥”），右转前行数十米，池塘边草地中有石碑兀然而立，此即为北大复制的“联大碑”（下页左上图）。

北大“联大碑”的揭幕时间，在1989年5月4日校庆日。此碑仅复制了“联大碑”的碑身，而没有外面的保护层。该碑坐落在一个有三级台阶的石砌平台之上，正面向西，背面底座上刻有“庆祝西南联大建校五十周年复制西南联大纪念碑”字



样。28年过去了，在成年人手可以触摸的地方，石碑上有几处已被擦得锃亮，足见来此凭吊者之多。

去碑西南数米有卧石，上刻相关的介绍文字称：“1988年，为纪念西南联合大学的业绩，北京大学决定复制该碑立于校园内，即派专人赴滇采相同石质的碑体运京，制作后于1989年5月4日举行了此碑的揭幕仪式。”

北大复制的“联大碑”十分朴素，没有过多的设计元素，说明文字中也只言事，而未及其他。不知学校档案中，对复制此碑的来龙去脉可有完整的记录？其实，在笔者看来，有无记录并不重要，我们知晓的是，复制此碑时，执掌北大的是丁石孙校长。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季羨林发表讲话时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见《丁石孙：北大往事》，载《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46期）

四、南开校园中的“联大碑”

今日天津八里台的南开校园，是浴火重生的产物。1937年7月29日凌晨，侵华日军丧心病狂，将这所成绩卓著的私立大学夷为平地。但有中国就有南开，八年流离之后，南开重返津门，并完成了由私立

到公立的蜕变。作为西南联大三校中的一员，南开也牢记着那段岁月，并立碑以志永恒。

1988年10月17日，南开曾在马蹄湖西岸立过一方“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纪念碑”。据云，该碑由主碑、三校校徽碑及纪年的基石三部分组成。主碑碑文由黄钰生先生撰文并书写。主碑是由三个石块黏合而成的“山”字形大石，碑身正面镌刻着黄钰生先生撰文并书写的碑文。校徽碑由三块条石连成一体，三面分别镶嵌南开、北大、清华三校校徽，石碑连接处上方镶有西南联大校徽。日前，笔者专程前往寻访此碑，然遍问路人，竟无一知者。后据老照片比对，笔者认定一处人工整修过的地基就是原碑所在，并在东南角草丛中找到了说明碑石。何以要拆除此碑，笔者不免困惑。回京后，经多方咨询，才知晓答案：2007年南开复制“联大碑”后，即将此拆除，主碑移至津南新校区内西南联大纪念园中，校徽碑则告消失。

2007年9月13日，南开复制的“联大碑”在校内揭幕。该碑位于大中路西首南侧，完全复制了原碑的样式（下图）。碑的正面朝北，正面下方有八级台阶，台阶中间镶嵌有一块石碑，上刻南开大学教



授范曾题写的碑记。碑之西北、西南石板上，镶嵌有9个高约30厘米的方形石柱，每个石柱上分别刻有1937—1945各年份的数字，意指西南联大存续的年代。

和平的环境，充足的物质保障，是办好一所大学乃至任何事情的基础。“大师”固然重要，“大楼”亦不可或缺。西南联大的成立，是战争状态下的不得已。

没有人会留恋战时的苦难，西南联大让我们不断回味的，是她沉淀下来的那些可以勒之贞珉、烛之后世的精神。困扰中国的“大学之问”有很多，但从“联大碑”中庶几可以找到不少的启示。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17日。此次转载，限于版面，作了较大压缩）

走近“零零阁”，追寻历史的踪迹

○ 孙 哲（1970届工物）

清华园是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出的14个“全球最美大学校园”之一，而近春园又是清华园内最美的风景点之一。近春园荷塘环绕，是朱自清先生著名散文《荷塘月色》所描写的地方。近春园内亭台楼阁，荷塘月色亭，晗亭，吴晗塑像，临漪榭，还有假山和石桥以及校友捐赠纪念碑石……星罗棋布，交相辉映，美不胜收。近春园西南有一座小山，山顶一座典雅的仿古观景亭，名曰“零零阁”。“零零阁”于1996年校庆落成，是00字班校友捐赠给母校的纪念建筑物。

“零零阁”为中国古典式双层重檐观景阁，地基座为160多平方米的花岗岩砌石，石基有护栏围绕，座柱上刻有全校00字班27个专业的名称。零零阁柱立八面、顶分双圆、红木起架、白玉砌栏，造型古朴典雅、气势宏伟壮观，彰显00字班学子深厚而执着眷恋母校之情。匾额“零零阁”由清华大学著名书法家金德年先生题写。



00字班校友庆祝毕业30周年在“零零阁”前留影

一、母校呼唤，00字班校友请缨

1995年是母校建校84周年。5月4日，校庆刚过，“零零阁”筹建组向00字班校